

析論七〇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

王惠珍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摘要

七〇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後，為因應台灣社會外部的轉變與讀書市場閱讀之需，台灣日語文學的譯介和傳播相形活絡。本文主要聚焦於台灣日語作家的作品於戰後出版市場中如何被翻譯出版，且又引發怎樣的文學論爭。七〇年代末以鍾肇政為首的譯者群在他主編的《民眾日報》副刊（1978.09-1980.02），及其它報紙副刊上刊載他們的文學翻譯作品。他為了延續文化這波影響力，更積極地尋找出版作家全集的管道，幾經挫折最後方由遠景出版社出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在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中傳播戰前台灣新文學的成就。

本論文主要藉由鍾肇政等人的書信集、訪談內容，重新拼貼出當時他們如何利用副刊版面和主流報界的人脈關係轉介譯作，讓「譯／異」聲在戒嚴時期文化場域邊緣有其發表的管道，讓戰後中文讀者重新「發現台灣」。但戰爭末期的譯作發表後，竟引發「皇民文學」等問題的討論。然，台灣社會也藉此機會重新認識台灣殖民經驗的光與影。總之，本文透過釐清七〇年代末台灣殖民地經驗的文學轉譯與傳播和出版活動之文化生產現象，說明這一波翻譯出版活動，在台灣文化翻譯發展史上的特殊性與歷史價值。

關鍵詞：鍾肇政、翻譯、傳播、出版、副刊

^{*} 本論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跨語世代的譯介：以「北鍾南葉」為例」（NSC：102-2628-H-007-005）中有關鍾肇政譯介活動研究的部分成果。另外，感謝匿名之審查委員提供寶貴意見，提供筆者參考修訂，謹此誌謝。

An Analysis for the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Japanese literature in Taiwan of the late 1970s

Wang Hui-Che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bstract

After the Native Literature Debates in the late 1970's, the introduction, translation, and circulation of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Japanese by Taiwanese authors became relatively active in Taiwan, primarily as a response to the change of the Taiwanese societ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ading market. This paper focuses on questions about how the Japanese literary works written by Taiwanese writers got published in the post-war Taiwan, and how this caused debates and controversies. Starting from the late 1970's, a group of translators, led by Zhong Zao-zheng, actively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literary works written in Japanese by Taiwanese authors in the literature sections of different newspapers, particularly noticeable being the People's Daily, of which Zhong was the chief editor. To extend the impact of this trend, Zhong looked for appropriate venues for publishing writers' complete works. Despite the difficulties, he managed to have Yuanjing Publication published "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Pre-war Taiwanese Literature", which is a remarkable event as it made known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New Taiwanese Literature of the pre-war time in the post-war Taiwanese societ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letters and interviews of Zhong and other personnel to reconstruct the scene at the time when they used literature sections of newspapers and networks in the main stream newspapers to publish their translations, and to make a different voice in the then highly restrictive social situation under the martial law. These translated works published at the time near the end of the war, however, triggered hot

debates on so-called “imperial literature”; this nonetheless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readers to once again approach facts and realities about the colonial governance that the Taiwanese society had experienced. In summary, this paper looks at the cultural and commercial activities about translation, circu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literary works bearing on the colonial experience, and examines the value and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in the translation history of Taiwan culture.

Keywords: Zhong Zao-zheng, Translation, Publication, Supplement



析論七〇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

一、前言

冷戰時期在美蘇對抗的國際情勢中，台灣國民黨政權對外依附新帝國美國以爭取外交的活動空間，對內挹注國家文化資源，宣揚反共抗俄與復興中華文化等官方意識型態，以此樹立政權在台的正統性。新美帝積極在東亞進行軍事布局，藉由美援將美國文化滲透進台灣社會成為指標性文化，以自由、民主為其核心價值，但為了帝國利益又與獨裁政權維持某種合作關係。舊帝國日本因韓戰和美方勢力的扶植，戰後快速重建，與舊殖民地藕斷絲連仍維持經貿上的合作關係。戰後面對中（國民黨政權）、美、日三方在台的複雜角力關係，台灣本土的殖民地文化問題並未被自主清理，隨即沒入民間社會成為另一股文化潛流。七〇年代隨著冷戰體制的鬆動瓦解，台灣社會內部的文化重編，以此為契機台灣知識分子才得以重新「發現台灣」。

在「回歸鄉土」或「回歸現實」的文化運動中，知識分子們開始著手重新挖掘日據時期新文學與歷史，但此時戰前世代的日語作家卻垂垂老矣，以龍瑛宗（1911-1999）為例，他是同世代作家中對文學執念最深的一位，1976年8月他從合作金庫退休後，重拾創作之筆展開新的文學寫作階段。許維育已在〈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中詳細地整理與論述他戰後「從沉潛到復出」、「第二個文學夢」。¹然，觀其復出的時間點，卻是在鄉土文學論戰前後，綜析他復出的主、客條件，可知除了作家個人主觀強烈的書寫欲望之外，七〇年代末台灣社會重啟文化「尋根」的時代氛圍也提供他一個現身／現聲的機會。龍掌握這波社會文化趨勢，積極地尋求發表機會，嘗試以中文撰寫回憶性的文章並

1 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

努力自譯舊作，企圖重返文壇。戰前日語創作已臻成熟的龍，跨語寫作絕非易事，從他殘留的筆記本和家人的追憶內容，可見其孜孜不倦勤練中文的艱辛過程。時不予我第二個文學夢對他而言仍遙不可及，在戰後文壇他總是被安置在戰前老作家的位置上，聊備一格。但，他仍因應時代之需稱職地演出，留下豐富的回憶性文章，以書寫見證了那一代殖民地日語作家被時代翻弄的無奈與悲情。

戰後最支持龍瑛宗復出的推手當以鍾肇政（1925-）莫屬，在鍾的譯介下方始他唯一的日語長篇小說《紅塵》和其它幾篇戰前的短篇小說得以自譯刊載於「民眾副刊」。若進一步按圖索驥整理龍瑛宗的譯介作品刊載處，在當時由外省籍作家所把持的台灣文壇裡，願意「收容」省籍作家作品的報刊雜誌，以具本土色彩的媒體居多。因此，他的創作和中譯作品大多刊載於具本土色彩的小報副刊如：「自立副刊」、「民眾副刊」等之上，偶爾才有機會刊載於「聯合副刊」中。在檢視龍瑛宗戰後的復出歷程，讓筆者想進一步追問，戰後台灣日語作家在台灣的文化場域中究竟以什麼方式現身？他們的作品又有何「容身之處」？顯然「翻譯」成為他們重返當代文壇的必然路徑，被遺忘的文學家龍瑛宗隨著這波歷史的浪頭，推上戰後台灣文學的媒體版面上。

近來台灣外省籍譯家的研究受備受關注，許俊雅針對左翼知識分子黎烈文來台後的翻譯出版活動進行深入的考察。²張俐璇以「新潮文庫」為例，說明譯者介入文學／文化生產的方式，文庫經由「二次翻譯」的過程媒合島內五四中國與台灣被殖民相異的文化經驗。同時，也說明了譯者翻譯／異／義，除了服膺反共主題之外，並隱匿偷渡左翼思想。³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中的翻譯活動，除了引介西方現代主義等的文化思潮等之外，亦是他們思想偷渡的方法之一。但除了域外文化的譯介之外，島內在七〇年代也展開了一場跨時代的翻譯活動，同樣值得關注。本文將以鍾肇政為探討的主要對象，聚焦七〇年代末

2 許俊雅，〈1946年之後的黎烈文——兼論其翻譯活動〉，《成大中文學報》38期（2012.09），頁141-176。

3 張俐璇，〈冷戰年代的翻譯介入——「新潮文庫」的譯者觀察（1967-1980）〉，《文史臺灣學報》3期（2011.12），頁53-98。

台灣日語文學譯介和出版現象的探討，釐清他在主編《民眾日報》副刊期間（1978.09-1980.02），及參與「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出版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而這樣的翻譯與出版活動又衍生出怎樣的爭議與討論。

文獻史料方面，本文主要使用鍾肇政與友人的個人書信⁴、《民眾日報》副刊，參酌鍾肇政、張良澤先生的口訪紀錄，以期釐清鍾肇政在進行跨時代轉譯的過程中，如何利用副刊版面、報界的人脈關係轉介譯作，讓「譯／異」聲在戒嚴時期的台灣文化場域邊緣發聲。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出版過程中，執行編輯者們又如何進行自我檢視以達到出版的目的。

戰前的台灣知識分子在歷經殖民統治、戰火洗禮、跨時代的衝擊，又遭逢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震懾，使得他們噤若寒蟬，對政治思想議題甚為敏感。譯介活動成為跨時代作家，避走政治風暴圈的重要跨語方式。七〇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結束後，隨著台灣政經社會情勢的轉變與讀書市場的閱讀之需，台灣文學的譯介和傳播相形活絡，本文透過闡述七〇年代具台灣殖民地經驗的文學轉譯與傳播和出版活動之文化生產現象，以期釐清這一波翻譯出版活動，在台灣文化翻譯發展史上的特殊性與歷史價值。

二、再發現台灣文學的歷史條件

七〇年代是台灣從素樸年代跨入多元社會的分水嶺，國內政局從老蔣時代到小蔣時代，對外關係有退出聯合國、保釣事件等紛至沓來。有人說：「我們可以拿『發現台灣』來形容七〇年代的思考核心。」⁵1972年戰前日語作家黃得時（1909-1999）〈臺灣光復前後的文藝活動與民族性〉（《新文藝》，1972年1月5日），吳瀛濤（1916-1971）遺作〈概述光復前的臺灣文學〉（《幼獅文藝》，1971年12月、1972年5月）陸續出現在文藝刊物上，七〇年代開始有一些優秀年輕的文藝史學家，如張良澤、林載爵、梁景峰等人，著手

4 《鍾肇政全集》自第23集至第29集共有七冊書信集，其中收有鍾肇政與鍾理和、張良澤、李喬、鄭清文、葉石濤等人的書信。

5 楊照，〈發現「中國」：台灣的七〇年代〉，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2），頁127-134。

整理日治時代台灣抗日文學的文獻史料，《文季》、《夏潮》、《大學雜誌》等雜誌，主動向前輩作家邀稿、舉行座談會與之對談，陸續介紹和評介具抵抗意識的文章，⁶使得戰前台灣新文學運動受到台灣社會大眾普遍的關注。

主倡中國民族主義的《夏潮》雜誌1976年2月創刊不久便積極地整理、研究台灣文學與台灣歷史的重塑，試圖在服膺正統中國歷史意識中偷渡批判與新詮釋，聯繫批判台灣七〇年代的社會現況，為其台灣本土觀察進行奠基。在整理的過程中，因《夏潮》內部成員的左翼色彩互異而出現了不同的類型，⁷但卻提供七〇年代讀者再閱讀再批評日據時代具抗爭型的台灣作家如：賴和、呂赫若、楊華、楊逵、吳新榮、吳濁流、張文環、王白淵等人作品的機會。其中雜誌社對左翼作家楊逵（1906-1985）著墨最深，並將他的中文創作集《羊頭集》（台北：輝煌出版社，1976）及其相關傳記評論《壓不扁的玫瑰花——楊逵的人與作品》（楊素娟編，1976）等集結成冊出版。另外，《夏潮》的「讀者天地」中讀者也對如此的文化整理給予肯定與期許：

譬如像本省前輩老作家張文環的小說〈論語與雞〉真是難得，一向臺灣的現代文學界對於日據時代的臺灣文學、藝術，都鮮有批評、介紹或整理，所以我們希望「夏潮」能逐期對臺灣過去的文學、歷史、民俗等做有系統的整理，能讓我們在西洋思潮的淹沒下，對自己的過去、未來做一番反省觀察。⁸

《夏潮》中雖陸續刊出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作品，但仍以中文作品居多，其中只譯出張文環的〈論語與雞〉（蕭碧盞譯）和呂赫若的〈牛車〉（謝敏譯⁹）。日語作品譯出後雖受到讀者的肯定，但較大規模系統性的翻譯出版活動要等到鄉土文學論戰之後。鄉土文學論戰前後台灣知識分子開始關注台灣本

6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尉天驄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尉天驄自印，1978.04），頁66。

7 郭紀舟，《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01），頁89-115。

8 林氏兄弟，「讀者天地」，《夏潮》7號（1976.10），頁82。

9 雖然標記譯者為謝敏，但經筆者核對譯文內容，實為轉載胡風收入《山靈——朝鮮臺灣短篇集》的譯文，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出版時間為1936年4月。

土文化發展的歷史進程，在這一波所謂的尋「根」熱浪中，¹⁰台灣文學耆老相繼被邀請至各種座談會中細說從前。七〇年代的台灣知識分子除了外求譯介西方文藝新知之外，也開始回眸關注台灣社會內部，回溯台灣的歷史文化，跨時代的譯介「台灣知識」成為另一種時代趨勢。

松永正義曾將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分成三個階段，¹¹第三階段始自1970年以後，當時伴隨國家主義的興起，鍾肇政在《臺灣文藝》裡企劃省籍作家鍾理和、吳濁流、張文環、葉榮鐘等的個人特輯。明潭出版社發行「日據下台灣新文學」五冊，遠景出版社也隨之刊行「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12冊。據此，松永將這個時期稱之為「再發現與彰顯時期」。但，他並未關注到當時本土性雜誌、報紙副刊的在此階段所扮演的角色。鍾肇政1976年繼吳濁流接下《臺灣文藝》的重擔，透過個人專輯企劃提供省籍作家重新被認識的機會，增闢「我的近況」專欄，邀集上一代的老作家現「聲」以助長《臺灣文藝》的聲勢。¹²1978年他受邀接掌「民眾副刊」時，適逢台灣報紙副刊轉型期，但他仍堅持以「純文學」為重，利用副刊、雜紙版面，承先整理譯介戰前台灣日語文學，啟後拔擢省籍新人作家，為省籍作家開展一個新的文學發展局面，他也銜領幾位跨語作家，策動這波台灣日語文學的轉譯與傳播。

但，除了雜誌之外，作為教育意識形態的機器報紙傳播媒體的社會影響力亦不容小覷。關於七〇年代中期的報紙副刊，高信疆主編《中國時報》的「人間副刊」、痾弦主編《聯合報》的「聯合副刊」並稱為兩大副刊。由於他們之間的競爭關係，進而帶動當時副刊形式的轉變，採以「計畫編輯」的方式對當代文化議題進行探討，導致傳統文藝副刊受到相當大的衝擊。¹³兩大副刊

10 郭啟賢，〈過去現在未來：獻給中國文學根的發掘者〉，《民眾日報·副刊》，1979.10.25，12版。
「光復後25年的今日，台灣文壇捲起尋「根」熱浪。整理台灣光復前台灣文學活動時，當可發現《台灣藝術》這本刊物，戰爭末期，完全變了質。憶起此一段往事，筆者心裡覺得無法自處，難以表達的感傷湧上心頭。」

11 松永正義，〈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林瑞明「賴和与台湾新文學運動」〉，《台灣近現代史研究》6號（1988.10），頁171-188。第一階段是，1945年至1950年，以日據下新文學的繼承及再出發為目標的時期。第二階段是，1950年至1970年的「保存時期」。第三階段是，1970年以後的「再發現與彰顯時期」。

12 洪炎秋，〈我的近況〉，《臺灣文藝》54期（1977.03），頁105。

13 封德屏，〈花園的園丁？還是媒體的英雄？〉，痾弦、陳義芝主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11），頁343-387。

朝向「新型副刊」發展之後，各報副刊也隨之跟進，副刊主編（文學傳播者）主動設定議題，乃至建構議題，掌握讀者所期待的媒介內容，進而創造出一個新的文學傳播模式，¹⁴ 在鄉土文學論戰的過程中，黨營、公營報刊紛紛為國家機器所動員，批判鄉土文學，根據焦桐的歸納分析，攻擊鄉土文學的一方，佔有主流媒體的優勢，砲火基地集中於大眾媒體副刊；提倡鄉土文學的一方，根據地卻分散於小眾雜誌，採行較為零星的邊緣戰鬥。最後論戰卻因《聯合報》的介入而擴大了鄉土文學運動的規模與影響，又加上意識型態國家機器的操縱，使得《中國時報》、《聯合報》各自代表同情、支持和攻擊鄉土文學的對峙立場。¹⁵ 這場論戰是台灣社會意識形態轉型的一次對決。論戰平息後，回歸鄉土、關懷本土的意識逐漸抬頭，台灣民間出現了一股追求台灣歷史知識的欲望，戰前台灣日語作家的翻譯活動趁勢而起，他們的譯作紛紛連載於當時的副刊，透過「鄉土寫實」的文學作品，召喚台灣的歷史記憶。

另外，若以文學社會學的觀點檢視這波文學生產活動，將令人想追問作家（譯者）、讀者、出版媒體等在其中各自分飾怎樣的角​​色？¹⁶ 他們又如何透過翻譯出現戲劇性的「回收」現象，讓長年被遺忘的作家，重新被認識。這樣的譯本生產究竟提供當時的台灣本土化論述怎樣的文​​化資源？顯然，在七〇年代知識分子追求本土化典範和建構台灣意識的過程，文化民族主義者相應而生，他們認為：

民族認同主要是個意識問題，它的基礎在於將民族獨特性的歷史地理所產生的特殊生活方式加以內化，而非僅僅參與當前國家統治下的社會政治過程。因此，文化民族主義者經常致力於保存、挖掘、甚至「創造」民族文化的特殊之處，認為這種文化特殊性是民族認同的基礎。¹⁷（下線筆者標示）

14 林淇濱，〈第二章 戰後台灣文學傳播困境：一個「文化研究」向度的觀察〉，《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05），頁67。

15 焦桐，〈意識形態拼圖——兩報副刊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權力操作〉，《國文天地》151期（1997.12），頁48-58。

16 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10）。

17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12），頁54-55。

七〇年代的文化民族主義者顯然並非以建立獨立自主的國家為首要信條，他們只想從中國民族主義褪脫確立民族文學，因此，重構台灣文化的特殊性，回溯日據時期台灣新文學的文學遺產變成有其必要性。此時「翻譯」成為他們保存、回收殖民地經驗的一種手段，藉由的日語作家作品的出土，以達成文化政治的目的，建立台灣文學傳統的系譜，為八〇年代台灣民族主義的文化論述提供重要的材料。但，這一階段的文化累積並非一蹴而成，而是長期地醞釀在歷史條件備足後，策略性地先透過報刊雜誌的刊出後，才採全集式出版呈現在讀者面前，並為九〇年代的研究者奠基。

三、報紙副刊作為譯介傳播的載體

在文化界七〇年代有兩大報文學獎的設立、純文學性的出版社紛紛設立、報紙副刊的變革等。1977年的「鄉土文學論戰」被戲稱為「七〇年代規模最大的一次吵架」，¹⁸因這一連串的外交挫敗，島內民族意識為之高漲，本土意識隨之抬頭，民間社會對官方展開政治、經濟改革等種種要求。這波島內的社會變革，提供台灣人重新「認識台灣」的歷史條件，戰前台灣新文學的出土研究才略見曙光。當時主流報紙的發行量頗大，報紙副刊對文化界具有相當大的傳播與影響力，根據林淇濱的研究台灣報紙副刊發展可分為幾個階段：「五〇年代稱為「綜合副刊」；六〇年代轉型為「文學副刊」，副刊漸受報業重視，並對文壇產生影響；七〇、八〇年代轉變成「文化副刊」，由於報社間競爭激烈，此階段的副刊最受重視。痲弦曾具體指出當時：「報社重視副刊的程度不亞於新聞版，甚至認定副刊的內容與方向攸關訂報率」。九〇年代副刊在報業市場的壓力下，逐漸走向「大眾副刊」之路。至於七〇年代的「文化副刊」的特徵為：內容的多元化、表現形式的多樣性、計畫性的傳播、知識分子的大量參與。」¹⁹。因此，台灣日語文學的譯作之所以選擇報紙副刊作為載體，與當

18 馮光遠，〈噓——報報七〇年代〉，楊澤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2），頁115。

19 林淇濱，〈「副」刊「大」業——台灣報紙副刊的文學傳播模式與分析〉，痲弦、陳義芝主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頁117-135。

時的副刊性質和傳播力有其密切的關係。

本節以討論鍾肇政主編「民眾副刊」（1978.02-1980.02）期間刊載譯作的情況為主，兼述「聯合副刊」、「自立副刊」的刊載情況為輔，釐清該時期「民眾副刊」的編輯方針與內容，以期說明鍾如何運用「副刊」版面在台灣文化場域邊緣發出譯／異聲，讓台灣日語作家得以現身／聲，藉由閱報者熟悉光復前台灣作家的譯作後，開啟他們對「光復前」台灣新文學的好奇心？

戒嚴期間報紙媒體言論受到官方嚴密的監控，如鍾肇政所言，主編「心中有個小警總」，報刊遭到停刊處分之事時有所聞。七〇年代各報的新聞報導內容大同小異，報紙副刊為吸引讀者群各出奇招。²⁰ 鄉土文學論戰後日治時期的台灣文學找到了歷史的縫隙，台灣的文史知識備受關注，經由副刊主編的「選擇」（selecting）和「加工」（processing），將它成為具本土性的抗拒性文化（oppositional culture）從「民間社會」崛起，試圖挑戰台灣文化場域中官方所主導的力量，利用這個機運本土人士展開一場跨越社會內部省籍文化和世代文化差異的譯介活動，進行台灣歷史文化經驗的縱深挖掘。以下檢視當時刊載譯作的主要三種副刊之刊載情況，並說明台灣日語作家與報紙副刊之間的互動關係。

（一）「聯合副刊」

《聯合報》創刊於1951年9月16日，歷經多次改稱於1957年6月20日始稱為《聯合報》（發行人王惕吾），報社以49年撤退來台的外省籍新聞從業人士為主，創刊時發刊部數約1萬2248份、61年約11萬8000份、77年60萬份、80年已超過100萬份，²¹ 依據發行部數可預估該報的社會影響力。

五〇、六〇年代的省籍作家們與「聯合副刊」的關係並不算特別熱絡，唯林海音主持「聯合副刊」期間（1954.01-1963.04），在她的提攜拔擢之下省

20 鍾肇政，〈台灣文學的起飛 開了個頭的日子——職掌民眾副刊的往事種種〉，民眾日報社史編纂委員會編，《民眾日報四十年史》（高雄：民眾日報社，1990.09），頁191-205。

21 赤松美和子，〈第三章 台灣的芥川賞——《聯合報》《中國時報》二大新聞の文学賞〉，《台灣文学と文学キャンプ—読者と作家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な創造空間》（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12.11），頁76-77。

籍作家如鍾肇政、鍾理和、黃春明等人才漸有在大報副刊發表的機會。²² 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聯合副刊」選擇為國家機器意識型態發聲，由於它是大報讀者數較多，也因此引起多數知識分子對論戰內容的關注，進而產生一些效應。當時台灣社會「本土化」的浪潮已勢不可擋，島內世代間的文化轉譯有其時代的需求性，「聯副」不得不正視台灣讀者的閱讀欲望，提供篇幅給台灣在地的文化議題。副刊主編痲弦等人特地於1978年10月25日台灣光復節當天舉辦了「光復前的台灣文學座談會」，邀集戰前台灣新文學作家與會座談。該座談會的目的，誠如痲弦的發言：「為了引起廣大社會的注意，我們想藉用報紙這個比較有力的傳播工具，以座談會的方式，交換意見，期能提出整理光復前台灣文學史料的具體方法。」²³ 「聯副」配合讀者市場主導這波尋根熱的方向。根據這場座談會內容，老作家們各抒己見，一一配合座談會主題，進行個人性的歷史回顧，但對鄉土文學論戰似乎仍有所顧忌。會中當王昶雄（1916-2000）欲對「鄉土文學」論戰表達意見：「鄉土文學的精神就是肯定我們祖國——中國」時，擔任主席的黃得時隨之以「最近鄉土文學的討論已告一段落，我們不必再加以討論。」加以制止，避免衍生不當的申論。劉捷（1911-2004）將鄉土文學與抗日思想連結，闡述一番己見。他們很有意識地將「民族精神」、「愛國情緒」、「中華文化薪火相傳」作為護身符，在抗日的民族主義論述脈絡中，強調戰前台灣人堅持「不輸給日本人」（郭水潭語）力證台灣人的民族矜持。會後，因痲弦的提議和黃武忠（1950-2005）的奔走連絡，讓這群文壇耆老以中文再現寶刀，重新喚起他們的文學夢，並將他們的跨語之作集結成《寶刀集》。²⁴ 另外，「聯副」配合系列活動亦於1978年11月開始刊載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譯介作品和相關的傳記評論作品，其中包含黃武忠對日治時代作家所進行

22 應鳳凰，〈林海音與六十年代台灣文壇——從主編的信探勘文學生產與運作〉，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2003.05），頁337-351。

23 聯合報編輯部編，〈附錄一 傳下去這把火〉，《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經出版社，1981.10），頁215-247。

24 黃武忠，〈一滴滋潤文壇的雨露——後記〉，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頁207-211。

的訪談記錄。²⁵

這些譯作刊於各副刊的概況，根據當時任職於遠景出版社的羊子喬的說法：

其實那時候這些老作家的作品，我曾經拿給聯合報，也登不少，給痲弦，除了《自立》之外。最主要給自立，再來就是《民眾》，民眾日報那時恰好鍾肇政那邊，拿一小部分給痲弦自己挑選，挑像龍瑛宗的作品，大概挑了兩三個作家去登。……。因為他跟中國時報在競爭。²⁶

可見，因大報副刊之間的競爭，才迫使「聯副」半被動地刊登這些譯作，同時《聯合報》經濟實力雄厚，稿費較為優渥，有其優先選擇譯稿的權利。「聯合副刊」的連載日譯作品的情況，主要以「光復前的台灣文學：重要作品選錄」為總標題，自1978年11月19日起至1979年6月12日，選錄有龍瑛宗〈一個女人的記錄〉（張良澤譯）、〈黃家〉（鍾肇政譯）；吳新榮〈亡妻記〉（鍾肇政譯）；葉石濤〈春怨——獻給恩師〉（鍾肇政譯）；吳希聖〈豚〉（李永熾譯）等小說作品，²⁷ 這些作品日後皆收入於「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之中。

（二）「自立副刊」

《自立晚報》創刊於1947年10月10日，為台灣第一份中文晚報，創辦人為顧培根，之後，經歷多次經營權轉移、搬遷和停刊處分。解嚴時期「自立副刊」在台灣文學的推廣上，曾發揮相當大的功能，不為主流媒體採內納的異議人士的作品，如刊載柏楊的〈異域〉、姚嘉文的〈台灣七色記〉，和出獄者陳映真、楊逵、楊青矗等人的作品。《自立晚報》在戰後台灣本土化的過程中曾

25 黃武忠費時三年對日治時代的作家進行的訪談，將其記錄集結成《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08）一書，文末以「傳下這把香火」為題，附上《聯合報》主辦的「光復前臺灣文學」座談會的內容。

26 黃崇軒，〈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頁141。

27 黃崇軒，「表六《聯合報·副刊》」，〈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頁174。

經扮演過重要的角色，「自立副刊」亦是省籍作家重要的發表重鎮，與鹽分地帶文學活動的關係密切，研究者黃崇軒業已針對「自立副刊」的編輯方針與傳播策略進行全面性詳細的探究。²⁸ 在前行研究的基礎上，本文則側重譯作本身在文化生產過程中，媒體副刊的角色扮演問題。

「自立副刊」在1977年之前都是由外省籍人士主編，1977年前後才由於詩人杜文靖（1947-2010）協助祝豐主編副刊，他因此成為該副刊的第一位省籍編輯人員。他自1979年5月4日起企劃長達39天的「鹽分地帶文學展」，介紹日治時期台灣文學，打破過去副刊、雜誌逢「五四」必以專文專題大肆紀念的傳統。為推翻宣揚「五四傳統」的形式主義，在羊子喬、月中泉、陳千武等詩人的協助之下蒐集和翻譯日治時期台灣作家的作品。杜任職「自立副刊」期間（1977-1981）被認為是該副刊「反共氛圍與日治時期文學交織階段。」²⁹ 羊子喬因結識杜文靖，而將部分譯作投至「自立副刊」，以「台灣光復前文學作品精選」為總標題，刊於1979年3月20日至5月3日期間，選刊的譯作有龍瑛宗自譯的詩作、小說〈黃昏月〉、呂赫若〈合家平安〉、〈財子壽〉、陳華培的小說〈豬祭〉、翁鬧〈天亮前的戀愛故事〉、〈音樂鐘〉、張文環的〈藝旦之家〉、巫永福的〈山茶花〉等。在此期間除了林芳年的〈文學隨筆——以小說「合家平安」為中心，談光復前舊友的文學作品〉（4.11）之外，主要是羊子喬撰寫的張文環、巫永福、呂赫若作家及其作品簡介。之後，「自立副刊」又另闢「日據時代台灣詩人詩作譯介」，自1980年11月3日至1981年4月14日止，每篇皆附上羊子喬的作者簡介，並連載黃武忠的「日據時代台灣作家小傳」。³⁰ 無論譯作或簡介之後大多皆收入於「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之中。

（三）「民眾副刊」

《民眾日報》於1950年9月5日由台灣省基隆市的李瑞標先生創刊，因資金

28 黃崇軒，「表七《自立副刊》關於日治時期作品譯介一覽表」，〈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頁174-175。

29 同註26，頁3。

30 黃武忠連載後的文章集結成《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出版。

不穩，致使經營權不斷更迭。報業因未能順利轉進台北，故於1978年將總社遷至新興的工業城市高雄，成為南部重要的報社之一，近年來由於經營權的爭奪問題，於2010年後結束營運。但，該報副刊長期以來都是高雄地區文化人重要的發表園地。

鍾肇政1977年3月接掌《臺灣文藝》的主編工作，但雜誌的篇幅畢竟有限。1978年8月他接受《民眾日報》之邀出任副刊主編，為省籍文友們作嫁，並奔告文友們「請盡力地寫，因為發表的園地已經不成問題了」。³¹ 文友李喬也承諾「我會要求幾個知己：以後的稿子一定要「眾副」不要才再及其他報刊。」³² 葉石濤也「嚴命彭君（筆者按：彭瑞金）撰寫《民眾日報》專欄，也就是我沒有辦法寫的時候，可以刊他所寫的，由我們兩個輪流執筆。」³³ 之後，鍾雖邀請其他評論者如許南村（陳映真）撰稿，但葉、彭兩人的評論或文學對話內容仍最常見於「每月對談評論」，由於當時報社支付的稿費甚為微薄，主編鍾日後為此甚感歉意。由於兩人任勞任怨地撰寫評論，使得小說來稿甚為踴躍，年度小說選僅僅「眾副」與《臺灣文藝》所發表的作品就佔了不少。³⁴ 鍾在掌管「眾副」期間複製《臺灣文藝》的編輯模式，在七〇年代報紙副刊雖是以「文化副刊」為主流，但他仍堅持純文學路線，強調文藝評論的功能，拓展省籍作家的發表空見，整備他的副刊班底希望與兩大副刊競逐。³⁵

鍾肇政初到民眾日報台北支社任職時，並未強勢主導副刊內容，他先從紙面筆談「理想的副刊」，爾後再邀集文壇人士現場座談，企圖凝聚副刊發展方向的共識，9月16日才始見「民眾副刊」大標。副刊內容主要分成：「主副刊」、「現代人」、「新論語」。「主副刊」由鍾主導採「文學副刊」型式，「現代人」由鄭羽書與劉蒼芝負責，主要刊載婦女、家庭、醫藥、幽默小品

31 鍾肇政，〈鍾肇政致葉石濤，1979.8.1〉，《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頁276。

32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8.8.？〉，《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頁507。

33 葉石濤，〈葉石濤致鍾肇政，1979.9.23〉，《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頁278。

34 鍾肇政，〈台灣文學的起飛 開了個頭的日子——職掌民眾副刊的往事種種〉，《民眾日報四十年史》，頁191-205。

35 同註34。

等，以滿足一般通俗讀者的閱讀需求。「新論語」內容以中國文化的介紹為主，為投合舊文人的掌故居多。³⁶李喬對「眾副」的「新論語」專欄內容頗為不滿，認為那是「落魄文人的閒談，百分之百腐臭氣的園地，有辱『民眾』的涵義。」³⁷鍾雖有意將它變成「鄉土趣味的」，但「眾副」內部似有其矛盾之處，李喬甚至直接質疑副刊立場，預言鍾肇政：「也許有一天，就在一年半載間，您半自動地掛冠求去」。³⁸但個性圓融通達的鍾自有其相應之道。

依據鍾肇政的回憶，副刊邀稿對象以省籍作家為主，據說約佔八成左右，他依文章中隱約所顯露的本土色彩和思維，辨認作者的省籍身分。當時副刊稿件大多是作者主動投寄的居多，主編偶爾也會主動向熟悉的作者邀稿。但更多是作者自行發覺副刊中常刊出本土性作品後，主動將具本土性色彩的作品投至「眾副」。最後，「眾副」版面之所以給人「本土副刊」的印象，非他刻意為之，而是自然形成的默契，由於當時投來的稿件已足夠支持版面，所以除了他初接副刊之際，曾發表具環保意識的小說〈白翎鷺之歌〉之外，鍾未再刊載自己的小說於「眾副」之上。³⁹

鍾肇政之所以堅守「眾副」其最大的目的，無非是為了讓以葉石濤為首的文友們有發表的版面，⁴⁰他犧牲自己的創作時間，努力為其他省籍作家們拓展發表園地，致使「『眾副』聲譽鵲起，已儼然第一副刊了，且新人輩出，老人彌健，連日據時代老作家都被我拉出來不少。」⁴¹鍾固守這個文學陣地一年多，最後因報社要求他南下赴任而辭掉「主編」的工作。

鍾肇政掌舵「主副刊」時除了刊載省籍新人作家的作品之外，也刊載戰

36 同註34。

37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8.11.？〉，《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頁518。

38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9.2.1〉，《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頁525。

39 2013年4月12日〈鍾肇政口述訪談稿〉內容。感謝鍾肇政先生以88歲之高齡接受訪談，在此謹表謝意。

40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3.6〉，《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頁478。「讓葉石濤為首的朋友們找發表處。我仍擬再挺若干時日，個人犧牲是必需的。我無怨言。但等局面安定下來以後，我仍會開始寫東西。」

41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10.31〉，《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99。

前台灣日語作家的譯作。在刊登譯作之前，他總是先讓老作家在「我的近況」⁴²專欄中現聲／身（相片）談生活近況，以達宣傳導讀之效。以龍瑛宗為例，在專欄中他先刊出隨筆〈身邊雜記片片〉（1979.03.23）後，才連載龍自譯的「龍瑛宗詩抄：歡鬧河邊的螞蟥們、花與痰盂、蟬、印度之歌」（03.24、03.25、03.26、04.01），繼而刊出他的自譯小說〈黑少女〉（06.05）、〈白鬼〉（06.15）。龍瑛宗因以〈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一作榮獲《改造》懸賞創作



陳清汾插畫

獎在戰前已頗負盛名，其日語作品已具相當的藝術水準，但此時以中文書寫仍顯吃力。根據鍾肇政的回憶，龍的自譯稿他皆曾加以修改潤筆，以盡主編之責。⁴³「眾副」的〈黑少女〉譯文後甚至附上戰前知名的畫家陳清汾（1910-1987）為該篇作品所畫的插畫，在副刊上「再現」戰前雜誌圖文的互文關係，文末附上龍添附的導讀圖文：

作者按：本短篇刊載於昭和十四年（民國二十八年）東京發行的《越過海洋》雜誌二月號。發行的是財團法人拓殖獎勵館，其宗旨為獎勵日本人海外發展併開拓經濟。申言之，以促進日本帝國國策為目的。譬如說，鼓勵內地的日本人來臺灣做官，可以享受六成的加俸，與本島人形

42 「『我的近況』……以前也在『台文』上做過，後因日據時代老作家不肯寫，所以就停了，這次我把範圍擴大，擬邀學術、藝文、出版界人士寫。首批邀稿信二月五日發出，也把××當做一個朋友發了。豈料二月十五日『聯副』搶先刊出『作家明信片』。（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10.31〉，《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74。）根據後文××應是症弦。《臺灣文藝》只見刊出洪炎秋的散文〈我的近況〉54期（1977.03），頁105-106。冒頭提到：「省籍作家鍾肇政先生給我來一封信說，《臺灣文藝》因為吳濁流社長不幸逝世，他不得不以負軛的心情接辦下來，並決定在二月份推出革新第一號。他為它設計了一個專欄：『我的近況』，向各方徵稿。要我也寫一短文，以增加聲勢。」。

43 依據鍾肇政口述訪問稿（2013.04.12）。龍瑛宗，〈白鬼的讀者〉，《大華晚報》，1985.07.06也曾提到：「我的〈白鬼〉逐譯工作，完成之日，拿著稿子跑至松江路的《民眾日報》辦公室去。在那裡鍾肇政負責副刊工作，好好先生的肇政，看完了我的中文稿以後，握起紅筆莞爾一笑而說：『老兄的文章，受日本文學的影響太深了，可稱病入膏肓了。有的地方，中國人看不懂。（老喬黑）的英文詩，刪除好了。老兄以為怎麼樣？』」但根據筆者實際核對中譯本、日文原文後，發現鍾還是尊重龍的意見，中譯文仍放入英詩，雖然譯文出現幾處誤譯、微調之處，但未影響小說內容。唯一值得關注的是，日文〈白鬼〉通篇作者為強調音樂性，為讓小說具有節奏感所以以短句為主，但中譯版重新分段後，偏重小說情節的發展，小說的氛圍為之一變。這樣的分段究竟是鍾的建議或是龍的本意不得而知，但譯文顯然已出現質變的問題。

成差別待遇，殖民地時代的情形，於此可見其一斑。

此文發表，匆匆已過了整整四十年。由於此刊專供日本人閱讀，當時未見流傳，手邊僅存的一份也被蟲蛀蝕甚多，面目全非，乃決予翻譯以圖保存，但是中文譯日文我略有經驗，以日文小說譯成中文倒屬頭一次，以我個人來說，不無感慨萬千。本短篇取材於本省養女問題，雖然光復以來養女問題改善甚多，但仍不失其時代意義。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原刊插圖成於當今實業鉅子陳清汾先生手筆。陳先生是位資深畫家，年輕時曾為日本畫壇重鎮有島生馬的入門弟子，陳先生的太太則是日本貴族田中子爵的小姐，他們的結合曾經轟動了整個文化界。特商得眾副主編先生的同意，將原刊插圖製版刊出。

龍瑛宗譯出的動機雖是「以圖保存」，但在導讀文中言簡意賅帶出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幾個重要的文學議題，如：殖民地差別待遇問題（加俸六成）、養女問題、內台通婚問題等。另外，日本的雜誌刊載台灣作家作品時，通常會找尋台人畫家插畫配合，以建構當時日人讀者整體的台灣想像。在此畫作中陳以簡約的線條，勾勒出身穿連身旗袍帶有支那風的台灣女子形象，而非苦命的殖民地少女。在主編的應允下，這篇小說的譯出再現，顯然已非單純的中、日語言的對譯，而是以圖文的方式喚起過往的殖民記憶。

除了龍瑛宗之外，尚有多位前輩作家在「我的近況」欄中現「聲」，如：巫永福〈不被打擾〉（1979.03.21）、林芳年〈讀書養性〉（1979.03.29）、水蔭萍（楊熾昌）〈封筆以後〉（1979.04.25）等人的圖文近況，根據標題他們戰後似乎都遠離台灣的文學場域。其中，楊熾昌提到他自1946年封筆以後，除了報社的工作之外，「對外從未寫過片言隻語，深知對一向熱愛的文學只是一大辜負，然而形勢比人強，只有認了。」「《聯副》為「台灣文學」提供了不少的篇幅，稱得上難能可貴，可是迄今仍在為夭折的孩子算年齡，想來不無感傷」，字裡行間不時流露出身為戰前台灣作家的遺憾與感傷。副刊除了刊載小說譯作之外，亦出現「龍瑛宗詩抄」和「郭啟賢詩選」（林鍾隆譯）的譯詩連載。根據鍾的回憶，這些似乎是偶然的譯作，因為「龍氏也只是偶然有詩作

出現而已，尤其龍是以小說為主的知名作家。」⁴⁴但西川滿曾說：「雖然大家都知道龍瑛宗是小說家，但他本來是詩人。雖然作品很少，但他很擅長西歐式的手法，開拓獨自的境地，這點應該特書一下。雖非近作但去年冬天寫的〈可烈菲特魯陷落〉等，可以寫出這樣作品，在臺灣無人能出其右。」⁴⁵其詩作的藝術性，在戰後似乎尚有其可讀之處。

「民眾副刊」受限於篇幅，除了連載鍾肇政自譯龍瑛宗的長篇《紅塵》之外，大都是短篇小說，主編以「日據時期作品精華」為總標題，路人譯出張文環的〈閩雞〉和翁鬧的〈憨伯仔〉；龍瑛宗、陳火泉兩人自譯作品；還有鄭清文、林鍾隆、廖清秀等人協助譯出，刊出時間為期約一年多之久。⁴⁶每當作品刊登之後，隨之刊出作者介紹或作品評論，如：彭瑞金的〈台灣文學的中譯〉、花村⁴⁷〈試評〈論語與雞〉、〈辣薤罐〉兼及文學的超越感〉等。

另外，張良澤似乎也嗅到時代的氣味，⁴⁸在他出國深造前後即主動積極地尋求機會與鍾肇政合作，希望展開一連串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中譯計畫，將譯作擇精在「眾副」上發表。⁴⁹《臺灣文藝》也趁勢為之，在1979年7月第63期刊出「日據時期台灣文學日文小說譯作專輯」，其中包括龍瑛宗的〈獏〉、巫永福的〈黑龍〉、張文環的〈夜猿〉、呂赫若的〈清秋〉等十篇作品。又因「聯副」示好，張良澤更躍躍欲試，計畫在「聯副」上譯介一系列日據時代台灣人文學，而於「眾副」譯介日人台灣文學，並著手翻譯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⁵⁰。張為何如此積極想譯介在台日人作品，根據他的回憶主要是當時他與友人相偕購得一批精美的舊雜誌書籍，深為西川滿的裝幀精美所吸引，方

44 同註43。

45 西川滿，〈台灣文學通信〉，《新潮》40年6號（1943.06），頁54-55。

46 請參閱附錄〈《民眾日報·副刊》（1979.01-1979.12）的日治時期台灣文學譯作〉。

47 根據2013.4.12鍾肇政口述訪問稿，花村為黃春秀的筆名，頗具才華，鍾曾有一段期間委請她為「民眾副刊」撰寫專欄「硯香集」。

48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8.11.12〉，《鍾肇政全集24 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64。「近來，挖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空氣高漲，我們也應該積極行動了。」

49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8.11.3〉，《鍾肇政全集24 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60。

50 張良澤，〈張良澤致鍾肇政，1979.2.13〉，《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71。「打算在『聯副』一系列譯介日據時代台灣人文學，而於『眾副』譯介日人台灣文學，已著手翻譯佐藤春夫的〈女誠扇綺譚〉，屆時請您修改。」

知日人作家的存在，進而想譯介他們的作品。⁵¹但對此計畫鍾卻有所保留，因「眾副」的版面很有限，葉石濤也反對刊載譯介日人作品，其主要的理由是：「《台文》麻煩已經夠多，目前不宜再因此惹人側目，據云，你（筆者按：張良澤）在《自立晚報》譯介的西川滿作品，有若干不良反應。」⁵²但鍾最後還是刊出〈女誠扇綺譚〉，採納張良澤的建議標題改為〈禿頭港的故事〉，由張撰寫導讀自1979年9月27日起至10月19日止共分23回刊畢。

當時鍾肇政主編「眾副」有聲有色，他與兩大報主編的關係為何？根據他的回憶：「他與當時兩大報副刊主編痲弦、高信疆之間並無私人上的往來，只有因副刊主編身分的同行關係，但內心裡說不定還可能有某種競爭意識存在，唯大家都相互尊重，見面會握手寒暄幾句。」⁵³根據當時書信內容，他有時受友人之託，需要主動與兩大副刊主編交涉。

要麻煩你寫信給高信疆，替我問問長六千六百字的評論〈論張文環的《在地上爬的人》〉什麼時候可以刊出？如果還要再拖下去的話，乾脆你就跟他要回來在《民眾日報》上發表，我相信這篇評論會是台灣文學史上一篇重要的論文。⁵⁴

同封寄「台灣原住民神話傳說」計31頁，六短篇。此稿已寄「聯副」月餘，無動靜。我性急，不能久等。你處若已爆滿，請轉寄自立晚報，或代介紹別處，希望近期刊出。⁵⁵

可見，鍾肇政除了編輯修改寄至「眾副」的文稿之外，尚得幫文友們轉介文稿，代尋可能的發表園地，畢竟當時的大報，如「聯副」的稿酬較「眾副」

51 受訪者：張良澤，日期：2014年7月31日，地點：真理大學麻豆校區，謹此誌謝。

52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8.22〉，《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95。張良澤譯介西川滿的〈鴨母皇帝〉於《自立晚報》副刊（1979.7.24-25）上，以「日據時期日本人在台灣文學作品選」為大標，但僅此一篇譯作。

53 根據 2013.4.12鍾肇政口述訪問稿。

54 葉石濤，〈葉石濤致鍾肇政，1978.9.23〉，《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頁279。

55 張良澤，〈張良澤致鍾肇政，1979.04.26〉，《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83。

（當時譯稿費千字約120元）優渥許多，⁵⁶鍾為了友人的收入，一切寬厚以待，「眾副」成為他們不得不的最後選擇。在這波尋根熱中，鍾肇政傾其心力埋首譯介台灣的日語文學或修訂譯稿，最後在書簡中大喊「我已譯怕了。」⁵⁷但在時代的鉅變中，他實踐傳承台灣內部文化薪傳的過程中，扮演極其重要的角色，其文化貢獻不容小覷。

在這一波以報紙副刊做為刊載園地的譯介傳播的過程中，在「讀者」端引發了兩個爭論，一為「皇民文學」的問題，二為「在台日人文學」的問題。前者以陳火泉的〈道〉、周金波的〈水癌〉、王昶雄的〈奔流〉的中譯刊載、編錄問題為主，後者以西川滿作品譯出的必要性為爭論焦點。⁵⁸

鍾肇政在邀集友人逐譯的過程中，最為棘手的問題是所謂「皇民文學」是否要譯出的問題。當時他將日文資料轉寄給譯者時屢遭拒絕，理由是：「這是皇民文學，不想譯。也不必譯。」但他卻認為「皇民文學」是日據時代台灣文學的一個盲點，而將這些作品為視為「受害者的記錄」，「在那個時代裡，它們確曾存在過，即令它們『不能見人』，但沒有人能否認它們的存在。既然如此，為它們留下一鱗半爪的痕跡，豈不也是做為一個後人的責任嗎？」⁵⁹本著如此的信念，鍾積極地鼓勵陳火泉自譯〈道〉，「發表的問題不僅無何妥當與否之處，而且還一定要發表出來；至於內容，在用詞方面稍作修飾無妨，但仍應以忠實為第一要件。」⁶⁰鍾信守承諾提供副刊版面連載刊出，因為這些文學既然真實地存在過台灣文學中，是台灣殖民地經驗的一部分，唯有將它譯出才

56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5.03.19〉，《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311。
「條件是以字數計，每千字一百二十元，作為買斷版權費」。

57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5.12〉，《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86。

58 張良澤曾於1979年11月15日於東京國文學研究資料館主辦的「第三回國際日本文學研究集會」中發表〈戰前の台灣に於ける日本文学—西川滿を例として〉一文，另外，他也在台灣報刊上發表幾篇西川滿的譯文。近藤正巳也於1980年發表〈西川滿札記（上）、（下）〉，《台灣風物》30卷3-4期（1980.09、1980.12），頁1-28、頁80-130。之後，許南村（陳映真）發表〈談西川滿與台灣文學〉，《文季》1卷6期（1984.03），頁1-11，對張的論點提出種種質疑與批判。張良澤又發表過〈戰前在臺灣的日本文學以西川滿為例兼致王曉波先生〉，《文季》2卷3期（1984.09），頁16-27。回敬，關於在戰後的譯介活動中，西川滿文學定位的評價問題，將留待另文討論。

59 鍾肇政，〈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鍾肇政全集19·隨筆集（三）》（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頁634-646。

60 同註59。

能接受歷史的檢視，殖民地傷痕才得以清理。

陳火泉自譯的〈道〉自1979年7月7日至8月16日（共39回）連載於「民眾副刊」，刊出後作家李喬也在給鍾肇政的信件中，提出〈道〉中譯文的問題，一再如下陳述已見：

看了聯副大作〈皇民——〉（筆者按：1979.04.19），有一句不吐不快，那就是陳火泉先生的〈道〉中譯問題。記得吳老曾一再表示，〈道〉是「皇民化文學」……

我想：中譯發表時，如果祇是「修飾」倒無不可，但如果主題都「改」了，那就是嚴重作弊：那種環境，縱然「皇民」也不必苛責，「現在」要寫「反日」亦可，但如把「媚日」舊作改寫成「抗日」，那就雙重作弊了。我的建議是：如果你手上發表，或出書，你應要求看過原文才行，此有關您的羽毛風骨，請注意才好。⁶¹

陳老之〈道〉，我想是：原文照譯，彼本人以為無妨，就發表也罷。我的意思是：無論如何不可「作弊」——把主題作任何「改寫」以欺世人，寫過「御用作品」就寫了罷，也可以再寫反日作品，但不可以把前者「改寫」成後者，若然其心可誅？雙重有罪也，公以為然否？公乃目前祭酒身分，請慎重才好。⁶²

我發現閒談中朋友們和我的意見相似，請您一定要看過原文——實際上這種「問題作」，該別人譯才更公正。⁶³

〈道〉讀了幾天，倒沒有發現什麼「問題」，其迂迴曲折之妙，令人嘆

61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9.06.04〉，《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頁532。

62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9.06.11〉，《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頁533。

63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9.07.05〉，《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頁534。

服，不喜歡的是那種「知識人」的自憐人物也。⁶⁴

從李喬的信件可知，即使是省籍作家中也對鍾刊出陳火泉〈道〉的譯出抱持許多疑慮，鍾為取信於讀者，特地在作品刊出前於「眾副」上發表〈問題小說〈道〉及作者陳火泉〉（1979.07.01）強調「譯筆謹慎而忠誠，完全可以信賴」。當時林梵也認為應譯出來讓眾人討論，否則年輕一代道聽塗說不足為憑。

但譯文一刊出後文壇砲聲隆隆，隨即出現：「李南衡也與陳映真共同呼籲：絕不允許當年無骨氣的『皇民文學』，今天重以『被害者文學』的偽裝面貌出現！這跟民眾副刊昨日開始連載刊出陳火泉的〈道〉有關」。⁶⁵甚至連張良澤也參加撻伐行列。⁶⁶有過殖民地經驗的鍾肇政七〇年代末的擇譯標準顯然並未全然追隨中國民族主義的立場，以「道德」、「抗日」標準裁量這篇作品。他單純地自認為有責任將戰前台灣人的殖民地經驗譯出，將這些作品當做「可憐的受害者的血淋淋的記錄」或者「一個時代的歷史證言」。他希望透過譯作讓戰後的「讀者」重新認識台灣歷史的某個真實面貌，即使是被扭曲的「精神荒蕪」，亦曾是殖民下一部分台灣人的「真實」精神面貌。的確，戰後當我們重構帝國記憶進行帝國批判時，對這些作品實難視而不見。

鍾肇政在「眾副」年餘，秉持著「為台灣文學而生」的信仰全力以赴，以「譯介」為方法，以報紙副刊版面為載體，將前輩作家們的作品介紹給戰後的台灣讀者，期待他們有機會跨時代重新認識戰前台灣的日語文學。

四、遠景出版社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

現代的出版商夾在作家的主張與讀者群眾的索求之間，試圖代表群眾去影響作者，又假作者的力量影響讀者，以達到二者交互揣摩影響的功能。⁶⁷同樣地在台灣日語作家的譯本產出過程中，出版商亦扮演重要的角色。誠如前述

64 李喬，〈李喬致鍾肇政，1979.07.16〉，《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頁535。

65 林梵，〈少尉的兩個世界〉（台南：台南市文化局，1995.04），頁376。

66 張良澤，〈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聯合報》，1998.02.10，41版。

67 Robert Escarpit著，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頁79。

「翻譯」是戰後跨語世代重要的書寫方式之一，如：鍾肇政始於1954年2月即在《自由談》中譯介南川潤的〈迷途的羔羊〉，且受當時聯副主編林海音之託，由短篇到長篇陸續翻譯一些日語作品，寫、譯並行。⁶⁸鄭清文也是在譯過川端康成的〈化妝〉（1957.12.23）刊於聯副後，才發表第一篇小說〈寂寞的心〉（1958.03.13）於「聯副」之上開展他的寫、譯的小說家生涯。⁶⁹他們的譯寫能力漸受出版界關注，志文、遠景出版社等陸續邀約出版譯作。他們的譯寫活動除了翻譯日本文學作家作品之外，也因應出版社的商業出版之需，翻譯不少實用性、通俗性的日文書籍。以作家林佛兒的林白出版社為例，鍾肇政曾為該出版社譯過一些實用性的大眾讀物如：《幽默心理學》、《夫妻之道》、《高中生心理學》等，讓當時林白出版社的財務狀況化險為夷。⁷⁰在戰後跨語作家們的譯作讀者群，除了純文學的讀者之外，尚應隱藏一群大眾消費讀者群。

在戰後台灣翻譯界裡鍾肇政譯作的質量，少可出其右者，⁷¹他在林海音主編「聯副」期間，擔任重要的譯手，他的譯功備受文壇肯定，在擔任「民眾副刊」主編期間，除了自譯台灣日語作家的作品之外，還需親自幫其他譯者校譯，工作甚為繁重辛苦。根據他與其他文友之間的往返書信，可知，他的文學譯介工作有時應友人之邀，如：「協助陌上桑推出文學雜誌（按：《這一代》）。第一期的特集是安部公房，我得翻譯幾篇的評論。」⁷²他主編《臺灣文藝》期間推出「作家專輯研究」頗受好評，但因欠缺文學評論，所以他自

68 應鳳凰，〈勤寫譯、多參賽、砥礪文友：鍾肇政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學運動〉，《聯合文學》230期（2003.12），頁141-144。

69 李進益編選，〈文學年表〉，《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26 鄭清文》（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03），頁53-87。

70 林佛兒曾於「『郵寄文情』——談鍾肇政的書信和刊物」座談會（講者：張良澤與林佛兒。主辦單位：龍潭文學館工作站，地點：龍潭鄉武德殿，時間：2013.03.03。）中談及，他1968年創辦林白出版社，因出版文學性的「河馬文庫」致使出版社財務告急，所幸仗其選書才華，轉變出版經營策略改以出版大眾性讀物，方始經營轉虧為盈。（筆者按：河馬文庫收入書籍，以台灣作家為主，其中有七等生的《僵局》、葉石濤的《羅桑榮和十個女人》、鍾肇政的《江山萬里》、李敏勇的《雲的告白》等作品。）

71 莊華堂主編，《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 十二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8.07），頁134。鍾肇政言：「翻譯是我一輩子的，跟創作一樣，我一輩子的成績。」

72 葉石濤，〈葉石濤致鍾肇政，1979.06.12〉，《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頁348。

1977年10月（革新第三號）起使用「路人」的筆名以「文藝批評的方法」為總標題，親自投入翻譯系統性的文藝理論。

翻譯是件相當勞心勞力的工作，但稿酬微薄，相較於鍾肇政，葉石濤對於文學「譯業」始終興趣不大，甚至提到：「因為必需要自己的思想完全跟作者吻合。」⁷³ 他才會投入其中。當時採買斷式計價譯稿費低廉，他熬夜苦撐一個月不過譯個十萬字內外，讓他心生厭倦。⁷⁴ 譯稿的苦悶心酸牢騷一樣出現在鍾肇政的書信中：

多月來拼老命譯東西，仍還是趕不上窮，眼看又要添新債了。《太》書（筆者按：《太陽與鐵》）艱奧之極，更是嘔心瀝血，四萬五千字僅兩千元，那幾天每天苦吟十小時左右，弄得渾身疲累，困憊之極！（略）共六千元還不知幾時才能拿到錢呢！⁷⁵

為了養家活口，鍾肇政不斷地搖動他的譯筆熬過艱辛的歲月，譯出的作品之多，讓他自豪地說：「大概是全國最多的一位。現在我老了。內心微微地驕傲一下。」⁷⁶ 兩位相濡以沫的文友在書信中發完牢騷後，總會相互砥礪，繼續鬻譯文維生。總之，他們的譯介活動內容，除了有其個人高瞻遠矚的文學理想和時代的使命感之外，亦是他們在窮困的年代裡補貼家用的經濟來源之一，在其中追求生活的平衡感。因此，他們的翻譯活動經常配合出版社之需，生產多種通俗、實用性的譯作，但他們的文學譯作卻影響了台灣戰後新一代的讀者。

鍾肇政在1965年出版了《臺灣省籍作家作品集》、《臺灣省青年文學叢書》後，期待有朝一日能替前輩作家出版作品集，是他翻譯工程的目標。在此之前他曾廣發英雄帖詢問葉石濤等人是否有意翻譯前輩作家如龍瑛宗或張文環等人的作品？並找到出版商出版譯文。⁷⁷ 邀集翻譯者的過程並不順利也頗向葉

73 葉石濤，〈葉石濤致鍾肇政，1974.04.24〉，《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頁244。

74 葉石濤，〈葉石濤致鍾肇政，1974.10.06〉，《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頁246。

75 張良澤，〈煎熬與希望的中年時代——七〇年代的鍾老大〉，《文訊》230期（2003.12），頁149-150。

76 莊華堂主編，《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十二講》，頁134。

77 同註76。

石濤請求協助。⁷⁸但在他殷勤的委託下，翻譯班底從跨語的一代到新培訓的譯者群也逐漸成形。

七〇年代末因台灣社會政經出現變革，出版界亦出現對本土文化發展懷抱理想的出版人，他們秉持著對台灣文學的熱情和理想，挹注資金投入省籍作家作品的出版。如：高雄三信出版社，它原本是高雄三信高商於1970年8月創辦的出版社，一年後即自設印刷廠，採一貫作業方式，轉而「以廠養社」的方式。該社為雪高雄為「文化沙漠」之恥，以有限的人手在廣泛的文化領域中，慎選夠水準的譯著上梓，尤其致力於刊印台灣作家的創作文類而受到海內外讀者的關注。⁷⁹目前南台灣文學的出版重鎮春暉出版社社長陳坤崙，亦因曾任職於該出版社而進入出版界，並複製三信出版社「以廠養社」的方式，為出版台灣作家作品集付出相當大的心力。⁸⁰

鍾肇政早在1975年3月左右便開始著手日治時期台灣文學《台灣鄉土文學全集》的編譯工作，原預計由高雄三信出版社出版。⁸¹但因三信編輯部內部意見歧異，「楊（逵）、吳（濁流）等人的作品不敢印行。張深切亦因光復後有中文作品，不擬印等」，全集的刊行因而觸礁。但鍾仍積極與《夏潮》的林載爵、梁景峰連絡，希望取得日語作家較為完整的作品。⁸²出版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計畫雖然一時受挫無法達成，但他仍伺機而動，1977、1978年是所謂的「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年」，但1979年轉而成為「日據時期台灣文學年」⁸³，李南衡主編的「日據下台灣新文學」明集和遠景出版社的「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於1979年相繼出版，各報副刊競相刊登此類作品。鍾肇政為了遠景這套作品全集的出版，積極地投入譯介，將他譯出的十萬多字的譯作，分別刊登在各報副刊上，如「眾副」、「聯副」、「自立」、「台副」、「台時」中。⁸⁴論

78 鍾肇政，〈鍾肇政致葉石濤，1979.04.14〉，《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頁306。信件內容：「預定中的陳千武氏至今全無音訊，人手不夠，再怎麼為難，也請你無論如何幫這個大忙。」

79 不著撰人，〈三信出版社專訪〉，《出版家》33期（1974.11），頁11。

80 陳學祈，〈寸草心，泥土情：春暉出版社〉，《文訊》299期（2010.09），頁138-145。

81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5.03.19〉，《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311。

82 同註81，〈鍾肇政致張良澤，1975.04.11〉，《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317。

83 鍾肇政，〈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民眾日報·副刊》，1979.06.01。

84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 1979.04.09〉，《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80。

戰之後在諸多主、客觀條件的配合下，其中包括出版人對台灣文化的使命感、跨語作家的再集結、新世代文化人的投入、媒體副刊的宣傳運用等，讓此套書籍得以在鄉土文學論戰後，台灣黨外運動如火如荼展開之際順利出版。據說1979年8月由黃信介發行的黨外政論性雜誌《美麗島》雜誌，因為發行狀況極佳，曾經一度由施明德出面希望與鍾肇政合作，但因施被捕入獄而告終。⁸⁵上一代的日語作家除了葉石濤之外，大都雖未挺身參與鄉土論戰的爭論，但他們默默地自譯或他譯的作品在論戰後卻開花結果，湧現於各個報紙副刊中備受關注。

戰前台灣作家全集的出版，因遠景出版社社長沈登恩（1949-2004）的出現才得以完成。1974年他與鄧維楨、王榮文三人共同創辦遠景出版社，出版台灣、香港作家作品，有計畫地出版大規模的全集。他一生熱愛出版，用生命燃燒理想，擘劃他的出版王國，在知識匱乏的七〇年代出版好書滋養眾多當代讀者也完成自己的夢想，在警總耳目密佈的時代裡是位勇於挑戰權威的人。⁸⁶沈以獨到的眼光出版過不少省籍作家的作品，如吳濁流、李喬、鍾肇政、黃春明、吳晟等人的作品。鍾肇政主編《臺灣文藝》時，亦曾接受遠景出版社的資助，讓《臺灣文藝》從季刊變成雙月刊，但編務工作則仍由鍾負責，出版社則負擔發行與稿酬等費用（每千字二百元），但只維持了九期。沈登恩在當時有「為一個書系成立一個出版社」的概念，他為出版台灣文學領域的作品而另外成立「遠行出版社」。1977年「遠行」曾企劃出版過張良澤主編的《吳濁流作品集》，但出版過程卻一波三折，其中《波茨坦科長》一書被警總查禁。⁸⁷

應鳳凰認為戰後五〇年來台灣文化生產場域從「他律」到「自主」，主要是由一些以出版經典好書為職志的文學出版人所建立起來的，他以文星出版社和遠景出版社為例說明之。其中，他認為遠景沈登恩因其選書獨具慧眼，不純以商業利益為考量，善於經營的他，將出版品與報紙副刊巧妙結合，七〇年

85 錢鴻鈞，〈鍾肇政內心深處的文學魂——向強權統治的周旋與鬥爭〉，《文學台灣》34期（2000.04），頁258-271。

86 葉麗晴，〈沈登恩的築夢人生〉，《文學台灣》34期，頁18-24。

87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12.3〉，《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13。

未出現了所謂的遠景旋風。⁸⁸ 沈因有其獨特的出版眼光與經營策略，他一向以「全集」的構想出版書籍，認為這樣才能經營作者的出版生命，或是一個議題才能豐富地累積，經得起再度的行銷。他精準地掌握台灣文學知識被需求的時代訊息，轉而與譯者合作，大手筆的全集出版「光復前台灣作家全集」堪稱是當時的壯舉，其中也揭示了媒體人、出版人攜手合作的可能。同時，時勢造譯者借此機運讓戰前台灣的日語文學出土，提供台灣讀者重新閱讀「台灣」的機會。因此，他被譽為台灣文學的先行出版者，因為戰後台灣文學的出版發揚若無他的助產，可能要得再等幾十年。⁸⁹ 張恆豪回憶當時沈登恩之所以會出這「光復前台灣作家全集」的理由，一方面是因為他是個有理想的出版者，懂得這些文學遺產不能被埋沒，另一方面他也知道這塊市場的存在，於是幾個三十歲上下的年輕人，就抱著衝撞禁忌的心情做著這套書。⁹⁰ 「光復前台灣作家全集」原本計畫出版小說、新詩、論述、劇本、隨筆共五種類，但由於銷路問題，到最後僅出版了小說和新詩部分而已。⁹¹ 此套全集在刊行之前，沈登恩便在「眾副」的「我的近況」專欄中，如數家珍般地為出版社的新書、世界文學全集和預計推出的「光復前台灣作家全集」大肆宣傳，他認為：

「台灣文學全集」的編纂，溶合了千鈞萬力之作，為台灣文學傳下一把絲延不絕的香火，在藝術價值的壑殖上和歷史意識的見證上，均將無可比擬。（中略）

台灣同胞抗日五十年，是中國近代史上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一頁。每一位關心民族，關心歷史的人，相信都將為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出版而給予喝采，給予鼓勵。⁹²

88 應鳳凰，〈文學出版與文化生產機制〉，《文訊》188期（2001.06），頁6-8。

89 張良澤，〈慰 沈登恩夫人〉，應鳳凰主編，《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 沈登恩紀念文集》（台北：遠景出版社，2009.09），頁119-124。

90 巫維珍，〈瞭望遠方的景色：遠景出版公司〉，封德屏主編，《台灣人文出版社30家》（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12），頁397-416。

91 羊子喬，〈追憶我在遠景的日子〉，《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 沈登恩紀念文集》，頁82-86。

92 沈登恩，〈我的獻禮〉，《民眾日報》，1979.03.11，12版。

該全集中小說作品共有八冊由鍾肇政、葉石濤掛主編之名，於1979年7月起陸續出版，詩作四冊由羊子喬（1951-）、陳千武（1922-2012）主編，於1982年5月後陸續出版。前者鍾肇政自己親自參與了翻譯工作，並委請其他譯者，如廖清秀（1927-）、鄭清文（1932-）、張良澤（1939-）等人協助，分頭負責譯出作品。葉石濤則是負責〈總序〉，闡釋這些作品在戰前台灣文學發展史上的意義。再由當時任職於遠景的羊子喬、張恆豪，和當時正在服兵役的林梵（林瑞明）負責撰寫作家簡介與解說，及編纂〈日據時期台灣小說年表〉的工作。羊子喬亦將部分譯文刊載在「自立副刊」等，適時地穿插作家簡介和作品解說。詩作集亦循此模式運作，即是先將詩的譯作與簡介刊於「自立副刊」的「日據時代台灣詩人詩作選介」專欄（1980.11.30-1981.04.14）上，之後才集結成冊發行。先於副刊上刊載，讓一般讀者先接觸熟悉戰前的台灣文學作品，以收宣傳之效，再由遠景出版社有計畫地集結整理出版，以此減輕出版社在翻譯稿費、宣傳費等的成本支出。

戒嚴時期民眾言論受到國家機器檢閱制度的層層監控，為求全集順利出版，三位執行編者謹慎撰文，於〈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⁹³開宗明義地說明：

台灣同胞以武裝或非武裝抵抗日本帝國侵略五十年，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極具沉雄悲壯的一章。日據下的台灣新文學運動，不僅是中國抗日的民族文化鬭爭的一環，而且也是台灣思想史上的一個啟蒙運動，它在中國近代的新文學史上，實具有不可磨滅的意義。（中略）。期望被塵封多年的光復前台灣新文學，能獲得世人的重視，以釐定它在中國文學史上應有的地位，這是我們編輯的宗旨與動機。（底線為筆者標註）

以此宣示編輯宗旨乃遵循中華民國抗日文藝史觀的立場，編選標準則是注重作品的藝術性、思想性及其時代性。文體形式以小說或具小說性質者。主題除了強調「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意識」，同時兼容並蓄反映當時的愛情觀念和浪漫的

93 張恆豪、林梵、羊子喬，〈出版宗旨及編輯體例〉，羊子喬、陳千武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頁3-4。

個人生活者。但下列現象者，則不得不割棄：

1. 作者因基於某種因素而未寫完者。
2. 作品被日本帝國主義的新聞檢查人員腰斬，以致難窺其全貌者。
3. 在寫實作品中，不是反映日據下的台灣經驗或台灣留學生的中國經驗與日本經驗。
4. 雖具有影響性，但卻是言情的大眾的文藝作品。
5. 限於篇幅，長篇小說俱割愛。
6. 日據下在台並反映台灣經驗的日人小說。
7. 寓褒貶於編選之中，凡是皇民化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以不選錄來隱示我們無言的、寬容的批判。

其中最具爭議性的莫過於第七項「皇民化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的認定問題。在譯介、選編的過程中內部出現了種種的歧見。陳火泉的〈道〉在副刊刊出後，即引起騷動，周金波的〈血癌〉和王昶雄的〈奔流〉卻在全集編選階段出現了爭議。張恆豪曾寄王昶雄的〈奔流〉給魏廷朝請他翻譯，他看過後將原稿退回，理由是他不譯這種呼應「皇民化」的御用作品。寄呂赫若的〈鄰居〉給鄭清文，他看後不置可否，他認為這種鼓吹日台親善的小說，譯出來並不妥當。⁹⁴但〈奔流〉最後仍收入卷八《閩雞》之中，根據張恆豪的〈解說〉⁹⁵：

在這全集的八卷中，本作可說是最受人爭議的一篇。有人說這是一篇皇民意味甚濃的御用作品，也有人說是一篇站在台灣人的立場，傾訴皇民化苦悶心聲的寫實小說。這兩種褒貶互見的論點，都可能影響到本篇小說的評價。

但他認為該作品中揭露了「一個台灣人在皇民化過程中的苦悶、徬徨、掙扎的

94 張恆豪，〈超越民族情節回歸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文星》99號（1986.09），頁124。

95 張恆豪，〈王昶雄 解說〉，《閩雞》（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頁257-258。

一面，其語調是嚴厲的、冷靜的、理性的」。在皇民化氣焰高漲的1943年，是有良知的台灣人要反皇民化的心聲，但只能「不得不隱裝、採取正話反說的方式。」為這篇文章進行辯護並給予正面評價。

又，在編輯過程中因羊子喬的「疏忽」，收錄了周金波的〈水癌〉，張恆豪試圖在〈解說〉中設法為周金波的作品開脫解套，根據已打樣的解說中遺留下的字跡：

最後如此寫道：「這就是現在的臺灣。正因為如此，正因為如此，才不能認輸。在那種女人身上所流的血，也是流在我身體中的血。不應該坐視，我的血也要洗乾淨。我可不是普通的醫生啊，我不是必須做同胞的心病的醫生嗎？怎麼可以認輸呢……。」此一心聲乃乍似贊成皇民化的假面下，真正告白。⁹⁶

張恆豪將作品「他」最後不服輸的呼告，解釋為對此「此一心聲乃乍似贊成皇民化的假面下，真正告白。」但，林瑞明仍覺得甚為不妥，因為他認為〈水癌〉一文是皇民文學。

周金波的《水癌》一文，是皇民化文學，羊子喬看得不仔細竟然選入。其中最嚴重是汙穢台灣人的血不乾淨，要將之洗清。我們可以體會決戰時期，台灣人「無地可容人痛哭，有時須忍淚歡呼」（葉榮鐘詩句）的悲苦，但完全失了台灣人立場的作品，我們不能選入。……。不管如何，堅持拿掉！不然會被拿來大作文章，搞不好書還會被查禁。⁹⁷

書籍和報刊副刊的影響時效性不同，檢閱當局對於書籍控管似乎較報刊更為嚴格，他們對於當局的檢閱機制心存警戒，為求順利出版，就得儘量在被允許的中華民國抗日文藝觀的規範下編纂全集，避免引起沒有必要的「麻煩」。編輯

96 羊子喬，〈歷史的悲劇·認同的盲點——讀周金波〈水癌〉、〈「尺」的誕生〉有感〉，《文學台灣》8期（1993.10），頁232。

97 林梵，《少尉的兩個世界》，頁359。

過程或許誠如中島所言：「最初，編輯者們因沒有事先確立編輯方針，而先完成作品翻譯，等到確立方針後，卻又因不合原則而取消。」⁹⁸至於全集中，最後為何仍放入王昶雄的〈奔流〉，而〈道〉被排除在外，林瑞明認為〈奔流〉中「我若是堂堂的日本人，就更非做個堂堂的台灣人不可」，最後至少維護台灣人的尊嚴，但陳火泉的〈道〉在決戰時期是皇民文學的代表作，戰後來看亦然，作家的處境雖然可以同情，但殖民地台灣的作家有無可推諉的責任！⁹⁹這也間接地說明了全集收入了〈奔流〉卻未收錄〈道〉的原因。在編纂出版過程中，對於「皇民文學」的認定問題，作者究竟是假面告白的逆寫帝國，亦是心悅臣服於皇民化政策之下，在解讀上至今仍有種種歧見，但當時執行編輯群採取較為保守的策略，排除眾議以「出版」為最高原則。

這些日治時期的台灣日語作家在戰後的文壇上知名度並不高，譯文先刊於各報的副刊上，雖有助於《全集》的宣傳，使《全集》的出版更具整體感，「自立副刊」也每兩個月都會刊登〈遠景書訊〉，但《全集》一開始並不好賣，只能算是長銷書。¹⁰⁰日治時期的台灣日語文學在跨世代譯者、報刊副刊主編、遠景出版社的合作下，最後留下以全集的形式出版傳播，讓這群前輩作家得以重新被戰後的台灣社會認識，戰前的文學美學經驗得以傳承，台灣的歷史知識可以延續，也為戰後台灣文學研究奠定了重要的文獻史料基礎。

五、結語

由上述內容可知，七〇年代末台灣日語文學的翻譯與出版活動，主要由代表左翼中國民族主義的《夏潮》成員首先發難，積極收集日治時期台灣作家們的作品，迎接他們重回戰後台灣文化場域。但，礙於語言隔閡的問題未能大量譯介出他們的日語作品。直到與代表台灣本土派的鍾肇政等跨語世代合作後，

98 中島利郎，〈つくられた「皇民作家」周金波——遠景出版社版『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序說》（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4.03），頁81-104。

99 林瑞明，〈騷動的靈魂——決戰時期的台灣作家與皇民文學〉，《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05），頁294-331。

100 黃崇軒，「羊子喬的訪談記錄」，〈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頁141。

才有計畫地譯出全集式的台灣文學集，但台灣省籍作家戰後一直處於台灣文學場域的邊緣位置，欠缺發表的媒體資源。在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後代表官方的主流媒體「聯合副刊」才正視這股新崛起的本土文化力量，提供版面刊載譯作。這三股勢力的交叉作用下所累積的翻譯成果，最後由對本土文學發展懷有理想的遠景出版社收割，以延續譯本的時效性培養台灣文學的讀者群。換言之，在這個文化生產的過程中，台灣鄉土文學論戰是啟動戰後台灣社會內部文化傳承與反思的重要契機，提供台灣讀者重新「發現台灣」的機會。遠景「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出版給予戰前日語作家們莫大的鼓勵，讓他們塵封二十多年的作品得以重見天日，讓戰後讀者因而得以一窺戰前台灣新文學的成就。

在這波譯介和傳播的文化生產中鍾肇政居功厥偉，當時他身兼數職除了小說家的身分之外，亦是「民眾副刊」、《臺灣文藝》的主編，在文壇邊緣鍥而不捨地努力，為了讓台灣日語文學的出土竭盡心力從事翻譯工作，動員個人的社群關係找尋在媒體版面上刊出譯作的機會，並進一步規劃出版等。彭瑞金在《鍾肇政評傳》中曾道：

鍾肇政像照顧嬰兒的祿母，像看顧莊稼的農夫、園丁，呵護台灣文學和作家，他要讓所有的幼苗都能成長茁壯，小樹變大樹，大樹變巨木，更願眾樹成林，不希望在自己成為一顆大樹後，四週仍一片荒涼。¹⁰¹

鍾肇政不只讓眾樹成林，他也藉由譯介活動和副刊的傳播，讓枯木逢春又新生，讓日治時期台灣文學的作品重新被閱讀和評價，其譯本對戰後台灣文學研究的奠基之功和影響力不容小覷。這一波日治時期台灣日語文學翻譯的出版，將「日本殖民統治作為一種資產」¹⁰²，為日後文化民族主義者對台灣文學史的建構與詮釋，累積了重要的文本資料。

然，當上一代人努力留下的譯本卸下時代任務時，當代的研究者又該如何看待這些譯本呢？戰後龍瑛宗提供給譯者（鍾肇政）的底稿版本是他戰爭末期

101 彭瑞金，《鍾肇政文學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03），頁116。

102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頁201-203。

遭禁的《蓮霧的庭院》的「校訂稿」，因此出現「原刊版」與「校訂版」譯本版本差異的問題。¹⁰³ 同樣地，由於老作家們所提供的譯文原稿版本不一，楊逵的〈送報伕〉跨時代有多種版本，¹⁰⁴ 張文環的〈夜猿〉亦有兩個版本，鍾肇政所使用的譯本是張文環親自改訂的，「重寫處約佔四分之一」，張良澤的譯本則是原刊物的作品。¹⁰⁵ 王昶雄的〈奔流〉亦出現林鍾隆譯的「遠景版」和戰後修訂的「前衛版」。¹⁰⁶ 顯然在翻譯產出的過程中，已出現文本的變異問題，內容攸關日語作家對戰前文本的自我反省和再詮釋等問題。因此，戰後作者的自譯文本應如何檢視？作家個人修訂譯稿的意圖為何？等等是下一階段重要的研究議題，唯有嚴謹地檢視譯本的產出過程，始能釐清殖民地作家戰後的清理與反思，進而發現另一種屬於台灣的後殖民地文本。

另外，若從東亞區域文化比較研究的視角觀之，當前韓國研究者金允植等人雖然試圖以「雙語作家」的觀點突破韓國親日文學二元對立的研究困境，¹⁰⁷ 但戰後在韓國除了零星的作品譯介之外，未見全集式的翻譯出版活動，他們對於朝鮮日語作品、作家是較為漠視的，縱然如韓國現代文學之父李光洙出版的十六卷全集也未收入他的日語作品。畢竟，戰前使用「日語」書寫對韓國人而言，是一種屈辱的、親日的象徵，直到2000年之後才有零星的翻譯成果。但，台灣卻早在七〇年末便積極進行台灣日語作家的翻譯出版，這與當時台灣陷入國際關係的困境，島內「反求諸己」有其密切的關係。這波島內的譯介出版活動，也折射出糾結其中的左翼中國民族主義者和台灣文化民族主義

103 王惠珍，〈殖民地文學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禁刊問題〉，《台灣文學研究集刊》9期（2011.02），頁53-90。

104 張恆豪的〈存其真貌——談〈送報伕〉譯本及延伸問題〉，《臺灣文藝》102期（1986.09），頁139-149；塚本照和的〈第一屆臺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學組補遺——簡介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並論楊逵著「新聞配達夫（送報伕）」的版本〉，《臺灣文學評論》4卷4期（2004.10），頁28-46。針對〈送報伕〉戰前的胡風譯本和戰後楊逵增補後的譯本差異進行說明。最大的差異點在於楊逵將被《文學評論》被查禁刪改的部分重新譯出。修改的重點有二：一是明顯的指控，將原先的批評，修改成為更為露骨的指責。二是加強氣勢，原先小說結尾的罷工只是淡化，改寫後卻增添集會場面，並給予更具體的渲染。收入於「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的作品是楊逵本人戰後重新翻譯並增補改寫之版本。

105 鍾肇政，〈鍾肇政致張良澤，1979.4.10〉，《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頁482。

106 呂興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評王昶雄〈奔流〉的校訂本〉，《國文天地》77期（1991.10），頁17-22。

107 承蒙2014年7月4日早稻田大學名譽教授大村益夫教授不吝賜教，謹此致謝。

者對舊殖民地文化的詮釋差異，及彼此勢力的消長，譯本的具體成果轉而成為台灣文化民族主義者進入八〇年代後民族文化想像與建構的文化材料，也讓台灣殖民地日語文學研究較韓國起步得更早。



附錄 《民眾日報·副刊》（1979.01-1979.12）¹⁰⁸ 的日治時期 台灣文學譯作

作者譯者	篇名／原出處	連載日期
巫永福作， 鄭清文譯	〈慾〉，《臺灣文學》1卷2期（1941.09）	1月6-9日（共4回）
張文環作， 廖清秀譯	〈辣荳罐〉，《台灣藝術》2號（1940.04）	1月22日
張文環作， 鍾肇政譯	〈論語與雞〉，《臺灣文學》1卷2號（1941.09）	原文未見，但根據花村的 〈試評〈論語與雞〉、〈辣 荳罐〉兼及文學的超越感〉 （1979.02.26）一文中的提示。
張文環作， 路人譯	〈閹雞〉，《臺灣文學》2卷4號（1942.10）	3月18日～4月1日（共15回）
呂赫若作， 鄭清文譯	〈風水〉，《臺灣文學》2卷4號（1942.10）	4月5-6日
楊逵作	〈牛犁分家〉	5月16日
郭啟賢作， 林鍾隆譯	〈郭啟賢詩選：二、獨語；三、青春；四、池畔； 五、秋像；六、十月的天空；七、這個出征〉	5月？、21、23、25、26、29、 30日（共7回）
翁鬧作， 路人譯	〈憨伯仔〉，《臺灣文藝》2卷7號（1935.07）	5月26-28日（共3回）
龍瑛宗自譯	〈龍瑛宗詩抄：歡鬧河邊的嬉某們、花與痰盂、 蟬、印度之歌〉、〈歡〉，《臺灣日日新報》 （1939.08.03）、〈花〉，《華麗島》創刊號 （1939.12.01）、〈蟬〉，《臺灣文學》3卷3期 （1943.07.03）、〈印〉，《台灣公論》8卷10號 （1943.10.01）	3月24-26日、4月1日
龍瑛宗自譯	〈黑少女〉，《海を越えて》2卷2期 （1939.02.01）	6月5日
龍瑛宗自譯	〈白鬼〉，《臺灣日日新報》（1939.07.13、22）	6月15日
陳火泉自譯	〈道〉，《文藝台灣》6卷3號（1943.07）	7月7日～8月16日（共39回）
龍瑛宗作， 鍾肇政譯	〈紅塵〉	6月20日～12月23日（共117 回）
楊逵作， 陌上桑譯	〈犬猴鄰居〉，《芽萌ゆる》，1944年（排版中 被查禁）	7月23日

108 目前國家圖書館的館藏資料，缺1978年10月～12月這三個月的資料，因民眾日報社已解散，經多次交涉仍未能尋獲原始資料，甚感遺憾。因此本文以1979年為主要整理對象，等待他日資料出土。論文撰寫期間，感謝協助資料複印整理的清大台文所碩士生陳采琪同學，謹此致謝。

參考資料

一、專書

- 中島利郎，《日本統治期台灣文學研究序說》（日本東京：綠蔭書房，2004.03）。
- 民眾日報社史編纂委員會編，《民眾日報四十年史》（高雄：民眾日報社，1990.09）。
- 羊子喬、陳千武主編，《光復前台灣文學全集》（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
- 李進益編選，《台灣現當代作家研究資料彙編26 鄭清文》（台南：國立台灣文學館，2012.03）。
- 李瑞騰主編，《霜後的燦爛——林海音及其同輩女作家學術研討論文集》（台南：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2003.05）。
- 赤松美和子，《台灣文學と文学キャンパー読者と作家の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な創造空間》（日本東京：東方書店，2012.11）。
- 林梵，《少尉的兩個世界》（台南：台南市文化局，1995.04）。
- 林淇瀟，《書寫與拼圖：台灣文學與傳播現象研究》（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05）。
- 林瑞明，《台灣文學的歷史考察》（台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05）。
- 封德屏編，《台灣人文出版社30家》（台北：文訊雜誌社，2008.12）。
- 尉天聰主編，《鄉土文學討論集》（台北：尉天聰自印，1978.04）。
- 張文環，《閩雞》（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07）。
- 莊華堂編，《鍾肇政口述歷史：戰後台灣文學發展史 十二講》（台北：唐山出版社，2008.07）。
- 郭紀舟，《70年代台灣左翼運動》（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1999.01）。
- 彭瑞金，《鍾肇政文學評傳》（高雄：春暉出版社，2009.03）。
- 黃武忠，《日據時代台灣新文學作家小傳》（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0.08）。
- 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94.12）。
- 痲弦主編，《世界中文報紙副刊學綜論》（台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1997.11）。
- 蕭阿勤，《重構台灣：當代民族主義的文化政治》（台北：聯經出版社，2012.12）。
- 應鳳凰主編，《嗨！再來一杯天國的咖啡 沈登恩紀念文集》（台北：遠景出版社，

2009.09)。

聯合報編輯部編，《寶刀集——光復前台灣作家作品集》（台北：聯經出版社，

1981.10）。

鍾肇政，《鍾肇政全集19・隨筆集（三）》（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

——，《鍾肇政全集24・書簡集（二）肝膽相照》（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

——，《鍾肇政全集25・書簡集（三）情深書簡》（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

——，《鍾肇政全集29・書簡集（七）純情書簡》（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4.03）。

Robert Escarpit，葉淑燕譯，《文學社會學》（台北：遠流出版社，2004.10）。

二、論文

（一）期刊論文

王惠珍，〈殖民地文學的傷痕——論龍瑛宗《蓮霧的庭院》的禁刊問題〉，《台灣文學研究集刊》9期（2011.02），頁53-90。

未著撰人，〈三信出版社專訪〉，《出版家》33期（1974.11），頁11。

羊子喬，〈歷史的悲劇・認同的盲點——讀周金波〈水癌〉、〈「尺」的誕生〉有感〉，《文學台灣》8期（1993.10），頁231-236。

西川滿，〈台灣文學通信〉，《新潮》40年6號（1943.06），頁54-55。

呂興昌，〈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評王昶雄〈奔流〉的校訂本〉，《國文天地》77期（1991.10），頁17-22。

松永正義，〈台灣新文學運動史研究の新しい段階——林瑞明「賴和与台湾新文學運動」〉，《台灣近現代史研究》6號（1988.10），頁171-188。

林氏兄弟，「讀者天地」，《夏潮》7號（1976.10），頁82。

洪炎秋，〈我的近況〉，《臺灣文藝》54期（1977.03），頁105。

張良澤，〈煎熬與希望的中年時代——七〇年代的鍾老大〉，《文訊》230期（2003.12），頁149-150。

張俐璇，〈冷戰年代的翻譯介入——「新潮文庫」的譯者觀察（1967-1980）〉，《文史台灣學報》3期（2011.12），頁53-98。

- 張恆豪，〈超越民族情節回歸文學本位：楊逵何時卸下〈首陽農園〉？〉，《文星》99號（1986.09），頁122-124。
- ，〈存其真貌——談〈送報伕〉譯本及延伸問題〉，《臺灣文藝》102期（1986.09），頁139-149。
- 許俊雅，〈1946年之後的黎烈文——兼論其翻譯活動〉，《成大中文學報》38期（2012.09），頁141-176。
- 陳學祈，〈寸草心，泥土情：春暉出版社〉，《文訊》299期（2010.09），頁138-145。
- 焦桐，〈意識形態拼圖——兩報副刊在鄉土文學論戰中的權力操作〉，《國文天地》151期（1997.12），頁48-58。
- 塚本照和，〈第一屆臺灣文學與語言國際學術研討會文學組補遺——簡介日本的臺灣文學研究：並論楊逵著「新聞配達夫（送報伕）」的版本〉，《臺灣文學評論》4卷4期（2004.10），頁28-46。
- 葉麗晴，〈沈登恩的築夢人生〉，《文學台灣》34期（2000.04），頁18-24。
- 錢鴻鈞，〈鍾肇政內心深處的文學魂——向強權統治的周旋與鬥爭〉，《文學台灣》34期（2000.04），頁258-271。
- 應鳳凰，〈文學出版與文化生產機制〉，《文訊》188期（2001.06），頁6-8。
- ，〈勤寫譯、多參賽、砥礪文友：鍾肇政與五〇年代台灣文學運動〉，《聯合文學》230期（2003.12），頁141-144。

（二）學位論文

- 許維育，〈戰後龍瑛宗及其文學研究〉（新竹：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1997）。
- 黃崇軒，〈建構本土·迎向群眾——「自立副刊」研究（1977-1987）〉（台中：靜宜大學中國文學系碩士論文，2007）。

三、報紙文章

- 沈登恩，〈我的獻禮〉，《民眾日報》，1979.03.11，12版。
- 張良澤，〈正視台灣文學史上的難題——關於台灣「皇民文學」作品拾遺〉，《聯合報》，1998.02.10，41版。
- 郭啟賢，〈過去現在未來：獻給中國文學根的發掘者〉，《民眾日報·副刊》，

1979.10.25，12版。

龍瑛宗，〈白鬼的讀者〉，《大華晚報》，1985.07.06。

鍾肇政，〈日據時代臺灣文學的盲點——對「皇民文學」的一個考察〉，《民眾日報·副刊》，1979.06.01，12版。

